

论理查德·罗蒂伦理思想美学定位三层面

郝二涛¹, 韩立平²

(1.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2.国家开放大学 纪检监察部, 北京 100039)

摘要: 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可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从西方美学史看,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是审美与伦理在后现代的重新融合;第二,从美学学科看,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是中西美学学科平等对话、融合互补的必然要求;第三,从美学理论的现实需求看,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是西方美学理论在感性、社会现实伦理、个体生存之间保持平衡,保持自身活力的需要。这对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准确定位具有基础性意义。

关键词: 伦理;美学;后现代;西方美学史;理查德·罗蒂

中图分类号: B8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014(2021)01-0083-08

DOI: 10.16514/j.cnki.cn43-1506/c.2021.01.013

理查德·罗蒂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和美学家之一。新世纪以来,虽然有零星的研究成果从美学角度研究罗蒂的哲学思想,但这些成果多集中在罗蒂的实用主义、文化哲学、政治哲学、诗学等层面,相对忽视对罗蒂的伦理思想美学定位之研究。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探究。

一、西方美学史层面:审美与伦理后现代融合

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体现在对当今已有的美学理论之批判性的阐释和创造性的融合中,这种融合只有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才凸显,其凸显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现实原因:现代化、全球化和物化

自19世纪50年代尤其是20世纪初期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物质层面的巨大变化

主要包括国家实力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层面的巨大变化包括新的哲学思想的诞生与人的精神危机。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巨变与反差使美学面临新挑战。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就是尝试应对这种新挑战。

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触及了当代西方美学研究中理论与现实脱节、划界与越界的问题。这意味着该问题之最终形成必须建立在对西方美学史中审美生活历程的清醒认识和对19世纪末以来西方社会文化现实的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就前者而言,以米利都学派为代表的自然美学派与希腊人关于美的观念的形而上学原则、道德主义原则、审美原则密切相关^[1],他们的观念有两个偏向。一个偏向形而上学与审美原则,以智者派为代表。这一偏向体现在以下思想和主义中:居勒尼学派的节制生活主义、希腊化时期的伊壁鸠鲁

收稿日期:2020-08-13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科学研究项目“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研究”(18B086);湖南省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课题项目“罗蒂审美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当代意义”(XSP19YBZ144)。

作者简介:郝二涛,男,河南周口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理论;

韩立平,男,北京人,国家开放大学纪检监察部工作人员,硕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艺理论。

享乐生活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近代英国的审美经验主义、夏夫茨伯里与哈奇生的审美的普遍幸福生活主义、夏尔·巴图的“美的艺术”思想、鲍姆嘉登的美学、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思想、费尔巴哈的幸福观念、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观念、杜威的实用主义等。另一个偏向形而上学与道德主义原则,以爱利亚学派为代表。苏格拉底继承了爱利亚学派的美学思想,吸收了灵魂不灭说、轮回说、希腊的奥尔弗斯神秘学说。毕达哥拉斯学派注重逻辑推理,提出了一种以数为中心的宇宙和谐美学思想^[2]。这种思想主要从几何结构、几何形体角度理解数和世界,比较侧重生活中事物的形式。

从犬儒学派的苦行观念、柏拉图的美德观念、亚里士多德理智的沉思观念、斯多葛学派的节欲观念一直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观念,呈现出审美生活与非审美生活两个方向。二者虽然有差异,但却都指向人的幸福生活。这种指向也是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的演变趋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美学经历了多次转向,美学研究者的视野虽然越来越宽广,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多,但与人的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却并未引起美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实际上是研究者在全球化语境中应对这种外部挑战的一种姿态。围绕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展开的当代西方美学的旨趣是努力解决社会文化现实中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中,美学研究者针对社会文化现实中与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理论,是美学学科保持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创新力的最直接的因素之一。但是,当代西方美学理论对当下社会文化艺术现象的特性、发展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的提问与阐释还不充分,通过理论的批评与阐释的活动来推动当下的艺术创作,引领当下的艺术潮流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在“生活”“消费”“创新”“自信”等成为当今时代最受关注的关键词的时候,当代美学研究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面对社会文化现实语境中的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

美学研究的历史告诉我们,把握美学学科的最新态势是保持美学学科生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3]。

因此,在回答当代西方美学理论面临的上述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对美学研究中的理性思维方式和具体学术理念进行反思,通过对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的研究推动美学对伦理问题的关注,促进西方美学在新世纪的复兴。

(二)理论原因:西方美学的阐释力危机

19世纪50年代以来,美学研究者虽然企图摆脱形而上学与知识论的影响,而实际上却将美学放在形而上学以及认识论的背景下来研究,致使对西方美学的现实意义与学科独立性的认识和估计不足,进而导致西方美学的现实特性、表达形式、学科价值等问题一度沉没于这种误读之中。基于这样的误读而建构起来的美学体系在面对新的艺术作品与现象时,往往缺乏普遍阐释力,而且其学术史依据与理论逻辑没有得到严密论证,其知识的合法性也面临危机。“美学已死”的呼声正是这种危机的最直接的反应。为应对这种危机,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应时而出。

21世纪以来,中外少数学者已对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有所觉察与研究。这与当代社会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功利主义盛行、全球化发展不可阻挡背景下,如何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密切相关。

二、美学学科层面:中西对话互补之要求

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之提出也是为了应对当代西方美学学科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与局限。这些突出表现为美学理论对文艺现象阐释的有效性与美学学科的知识合法性。正是在对这两个方面的危机与局限的克服中,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获得了现实意义。

从20世纪初期开始,在非理性主义思潮影响下,重获生机不久的现代西方美学理论又面临着深度心理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等观念的挑战,以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转型、人们的伦理生活变化等带来的考验。从西方艺术史看,在艺术与学院式模拟原则分离之前,康德美学理论以及深化了的康德美学理论被视为现代美学的典范^[4]。在此之后,康德美学理论及其传统也十分必要。直到今天,我们对罗

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也必须重视康德美学理论及其传统。但是,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审美现代性的洗礼之后,加之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新艺术、新技术、新文学文化现象、新的哲学观念的不断涌现,仅仅以康德美学理论来阐释这些文化艺术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辛苦建构出来的美学理论绝大多数并不被同行认同。这无疑加重了我们的焦虑感,进而对美学学科的知识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而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之凸显,就与美学学科的知识合法性危机密切相关。更为关键的是,认真解决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并充分展示该问题之美学意义,乃是克服长久以来西方美学所面临的知识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美学学科的整体来看,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是一个极具开放性与普遍性的问题。从当代西方美学所面临的学科知识合法性危机及以罗蒂为代表的当下新实用主义美学家阐发伦理思想的美学维度来看,准确地对罗蒂伦理思想进行美学定位仍然需要回顾西方美学史、西方哲学史、西方伦理学史,并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比较来实现。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也是一个处于不断的阐释过程之中,需要不断回顾与总结,不断地深入挖掘与反思的开放性和普遍性问题,更是需要美学研究者努力激活的问题。比如,我们发挥西方古典美学中伦理生活理论来建构西方当代美学理论,就要将当代人所面临的生活伦理问题放在当代西方美学的视野下,给出可能的、合理的阐释。这种阐释的过程也是对罗蒂伦理思想进行美学定位的过程。

在西方美学的历史长河中,审美生活理论并不是惟一的生活理论,还有与之对立的理性主义生活理论、非理性主义生活理论、实用主义生活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一定的历史时段中会居于主导地位。在它们不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审美生活理论成为一种潜在因素。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以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观念为起点,到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观念,再到席勒“提倡通过审美教育,使人摆脱理性与感性的分裂,达到‘自由’的状态”,直到马尔库塞“提倡心理革命,通过

欣赏艺术,克服单面人的状态”^[5]。可以说,在西方美学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内,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处于潜在状态。此后,直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福柯的生存美学及杜威和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出现后,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才凸显^[6]。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要激活这些潜在的审美生活理论的因子,使其为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服务。对此,西方美学研究者应该有理性的认识。对于当代西方美学而言,彻底坚守康德的美学传统抑或完全摒弃康德美学传统都不可行,也不必要。如果说100多年来西方美学理论在不断应对新的文化艺术现象、潮流的过程中,碰到了阐释的有效性问题的话,那么,时至今日,西方美学研究面对的主要是知识合法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将成为当代西方美学研究全面突破的重要途径。在这种语境中,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将会日益凸显其独特的现实意义。

从积极的一面看,有相当一部分西方美学研究者主张以“感性学”代替“美学”,恢复美学学科之本来面目。这种观点虽充满美学原教旨主义色彩,但也向我们昭示出当代西方美学研究者具备返本开新的勇气,并对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的内涵、属性、意义或许已有某种程度的共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无论是宣布“美学已死”还是倡导“美学重构”或者“美学复兴”,都是与当下的全球化语境、消费社会的文化现实,新技术、新媒体与新艺术现象的不断涌现等因素密切相关,体现了当下复杂的时代特点与美学研究的特点。

近年来,这些因素与特点已经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美学研究者的关注。尽管把握这些因素与特点十分艰难,但总体而言,它们既是不同文化传统对话与交流的结果,也是全球化语境中人本主义、反形而上学、实用主义等思潮发展的结果,还是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危机相互凸显的结果。这些特点既表现了当代西方美学研究无法有效阐释文化艺术现象和人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困境,又显示了研究者对美学学科知识合法性危机的焦虑。

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在文化研究的不断冲

击下,上述问题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这些问题隐含的理论前提是,哪一种美学理论更具有学术生命力?对此,美学研究者大体上有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认同鲍姆嘉登确立的感性认识的完善理论。这种倾向的美学以下列思想为代表:古希腊的居勒尼学派的节制生活理论、希腊化时期伊壁鸠鲁的享乐生活理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夏夫茨伯里和哈奇生的审美普遍幸福生活理论、夏尔·巴图的美的艺术观念、鲍姆嘉登的感性认识的完善理论、当代实用主义。其显著特点是贬抑理性、张扬感性。

第二种倾向认同康德确立的“审美无利害”理论,并以下列思想为代表: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夏夫茨伯里的“道德感官”理论,鲍姆嘉登、康德的“美学”,黑格尔、谢林的艺术哲学^[7]。其显著特点是贬抑感性、张扬理性。

这两种倾向尽管立场各异,但二者都以人的生活为中心,旨在使人生活得更好。而问题恰恰在于,西方当代美学理论能否仅仅从伦理的方向就能获得阐释的有效性和知识合法性。

美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补充以理性为中心的启蒙现代性,其合法性受到了审美(感性)生活理论的支持^[8]。在当时,主导美学的主要是归结为单一原理的美的艺术,比如,诗歌、绘画、舞蹈、雕塑、音乐、建筑。而美学作为启蒙现代性的一部分,与这些艺术的创作和批评实践并没有直接关联。美学理论远离艺术创作与批评实践,无异于遭到了“阉割”。奇怪的是,正是这种“阉割”使美学在启蒙现代性的语境中获得了知识合法性,并得以持续地发展与完善。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加之美学学科刚刚建立,西方美学研究者似乎没有必要、也没有足够时间来反思美学理论阐释的有效性和学科知识的合法性问题,自然也不会像今天的美学研究者一样有深重的焦虑感。

近年来,大多数美学研究者深入思考与努力解决的美学理论阐释有效性和知识合法性问题也表现在西方美学研究基本方法的实践与检验之中。以西方美学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文化艺术现象或建构中国美学理论一直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而用中国美学理论的概念、方法、范畴等梳理中国

古典美学的思想资源,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学科的尝试则比较少见。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借用自西方美学的概念、方法和范畴在中国美学的独特的语境中是否仍然对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现实之中的文艺现象与文艺作品具有阐释的有效性?以这些概念、方法和范畴等为基础建立的中国美学史学科是否具有知识合法性?这些质疑自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就有了。但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有待确立,再加上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学者的质疑声被迅速淹没。直到改革开放,这种质疑才得以清晰地表达出来。

从20世纪80年代初文艺美学学科建立到90年代“重写美学史”观念的提出,再到90年代末提出重构中国美学话语,西方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中国美学中的实践过程是与西方美学理论的阐释有效性、知识合法性危机的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西方美学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之中的应用、检验以及对中西古典美学问题之梳理是否能延续中国传统文化血脉,是否能发扬中华美学精神,美学研究者是有疑问的。这些疑问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发展而日益变成了一种严重的焦虑,这是中西美学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西方美学理论的阐释方法、范畴、话语、架构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美学学科的发展与完善。正是在引进西方美学理论的前提下,中国美学以传统美学资源为基础构建了不同于传统的体验性、诗性美学体系。这种美学体系大致有三种模式: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中西融合。其美学话语是在继承与重构的交织中产生的。

由于继承与重构美学话语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术语的借用、变换与思路的碰撞、吸收,而无论如何,这个过程都与审美生活理论的空间位移密切相关,因此,西方美学理论的阐释有效性和学科知识合法性问题也是审美生活理论在空间中位移的结果之一。基于此,我们在分析与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不应该纠缠于具体术语的借用与变换,而应该沿着美学史、哲学史、伦理学史、文化史中“审美理论”空间性位移的路径深入地分析、思考,以最终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能路径。

如果说上面所述的“审美理论”空间性位移属于显性位移（有明显线索可循的位移）的话，那么，促成审美理论发生变迁的各种思潮的空间性聚合与变化则属于隐性位移。这种思潮的隐性位移也是造成西方美学理论阐释有效性和知识合法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由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发展而成的进步主义思潮由欧洲位移到了美国，直接刺激了实用主义哲学的诞生^[9]。也比如，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从欧洲大陆隐性地位移到中国，与审美生活理论的空间性位移一起成为中国美学学科建立与完善的至关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人本主义思潮的隐性位移还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刺激了伦理思潮的诞生，并成为20世纪美学的主潮之一。这种伦理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审美理论，使其关注伦理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实用主义美学到了20世纪中后期，已经不能有效阐释先锋、前卫艺术品，陷入阐释有效性与知识合法性危机中。

尽管分析美学暂时应对了上述危机，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分析美学也无法有效解读层出不穷的艺术作品与艺术现象，且因注重概念分析而忽略了人的伦理生活，产生了阐释有效性和知识合法性问题。以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美学家的相关理论由于试图克服分析美学的上述缺陷而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学理论。其主要原因在于，显性位移到美国的审美生活理论与隐性位移到美国的人本主义、虔信主义、理性主义等思潮实现了有机融合。这种融合使审美理论直面当代人的伦理问题，既克服了分析美学忽略人的伦理生活的不足，又弥补了实用主义逻辑性、科学性之不足，还纠正了欧陆美学理论的形而上学倾向，并适应了美国思想由启蒙主义向注重人性和道德的超越主义转型的趋势^[10]。也就是说，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是审美理论与诸多思潮空间性位移与相互融合的结果。

同样，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西方美学理论在中国美学理论之中的应用与检验以及由此产生的阐释有效性和知识合法性问题也是这样产生的。比如，实践美学就是康德美学、皮亚杰的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苏珊·朗格的情感理论等从不

同的地方通过空间性位移来到中国文化语境之中，是针对当时中国思想启蒙、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问题而应对、积累、融创的结果。后实践美学也是如此。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演变的趋向就是越来越回到人本身，越来越回到人的伦理生活。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生活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全球化的发展使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变得越来越迫切。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美学的一种重要趋向。

因此，无论是西方美学，还是在西方美学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美学”，都在朝着伦理方向发展。这种方向得益于审美生活理论的显性空间位移与各种思潮的隐性的空间位移，也得益于二者在同一文化语境之中的互动融合。事实上，中国美学学科史就是西方美学理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之中实践、检验并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互动、融合的历史。前辈学者用西方美学理论建构中国美学，尽管独创性较小，但他们对“中国美学”学科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从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第一代学者，到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等第二代学者，再到李泽厚、蒋孔阳、汝信等第三代学者，最后到当代美学学者，他们都在尝试建立和完善中国美学学科。今天看来，这些尝试是有价值的。

20世纪中国美学学科的形成本身就是本土美学学习西方美学理论并不断尝试中国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研究自觉意识逐渐苏醒，开始关注美学本身存在的阐释有效性与知识合法性问题。新世纪以来，在交往与对话中，一些学者逐渐对上述问题有了新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尝试性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的一个突出共同点是中西美学的平等互动与有机融合。在我看来，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极有可能是中西美学之间平等的对话与有机融合的一个交汇点，也极有可能成为新世纪美学复兴的一个重要方向。以此为契机，之前提到的西方美学理论的阐释有效性和知识合法性问题或有望得到合理解决。

三、美学理论层面：保持自身活力的需要

1949年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巩固和迅猛发展，中国美学研究范式经历了认

识论、实践论、生活论转向。而同时期的西方美学研究范式经历了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转向^[11]。由此可见,美学研究实际上经历了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从人的精神生活研究到人的物质(感性)生活研究的转向。由于这种转向的出发点是人,目的也是为了使人的生活得更好,因此,这种转向也可以被概括为伦理转向。从小范围讲,这是包括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研究在内的当代美学研究的一种共同倾向。从大范围讲,这也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共同倾向。其原因可以从内和外两个层面来分析。从内因看,西方现代美学学科一开始就是作为启蒙现代性之补充而产生的。作为研究感性(审美)学科必然以启蒙理性主义的话语方式表现出来,必然忽略人的物质伦理生活。这种理性主义倾向在黑格尔的美学中达到了顶峰。美学成为理念(绝对精神)的感性显现。由于绝对精神与人的精神生活的关联性不大,因此,这种美学也没有集中关注人的精神生活。这种倾向直到尼采的美学才有所改观,尼采对悲剧诞生的研究已流露出对人精神生活的关怀。这种关怀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美学、心理学美学和存在主义美学中延续。由此产生的美学理论由于适应了19世纪中后期以来疗救人被异化的现实形势而获得了知识的合法性。又由于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之主题也涉及人的异化,因而,这些美学理论也获得了阐释有效性。但是,这种美学理论只对艺术家手工创作的艺术品具有阐释有效性,一旦出现机械复制的艺术品,其阐释有效性与知识合法性就会重新受到质疑。而20世纪初期兴起的实用主义美学较为注重人的伦理生活,主张艺术走向大众,为人的生活和社会服务。这种美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心理学美学之不足。但是,随着科学发展,机械复制艺术大量涌现,看起来与普通商品抑或日常生活用品没有差异,再加上实用主义美学左倾政治观、保守艺术观、科学哲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冲击,实用主义美学遂被分析美学取代^[12]。分析美学与之前的所有美学形态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人的伦理生活。而人的伦理生活本就是美学学科应该关注的核心内容之一,却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再从中国美学看,中国美学建立之初,以译介的德国古典美学为参照,其后虽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点,但基本延续了德国古典美学思想。改革开放后,尽管这种美学形态颇受欢迎,但它并未摆脱启蒙现代性的语境,对人的伦理生活的关注不够。因此,美学应该回归人的伦理生活,关注人的伦理生活。

无论是在西方美学还是在中国美学语境中,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都是合理的。而对该问题的忽视,或许正是美学理论之阐释有效性和美学学科知识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的最重要原因。从更深层次看,美学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所处的当代社会语境也不容忽视。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科学等方面迅速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所处的社会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知识增长越来越快,学科分化越来越精细,同时,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野也越来越严重。再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逐渐趋于数字化,知识在人们之间的传播速度加快,并在短时间内覆盖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性别与年龄的人群。这种数字化、可通约的、可复制性的知识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而独创性的、启示性的、不可通约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迅速被边缘化。可以说,现代社会知识的分化是导致人文社会科学迅速边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跨文化交流越来越流行。人文社会科学的“欧洲中心论”理念也逐渐演变为“多元化”“多样性”理念,出现了全球逐渐地方化、地方逐渐全球化的趋势。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非西方地区,而非西方地区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在积极地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挖掘与弘扬自身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的重要性。各方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日益频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迎来了交往与对话的时代^{[13]404-413}。

因此,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质疑^{[13]445}。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环境恶化、道德滑坡、社会碎片化等与人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更促使人们对以往的人文社会

科学理念进行反思和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就包括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单向的、直线式的、无限前进的进步观的质疑。这些实际上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阐释有效性和知识合法性的质疑。

在上述背景下审视当代美学的研究状况,总体上可以说,西方美学正在反思人的伦理生活,以解决当下面临的阐释有效性和知识合法性问题。可以说,这一过程是美学研究者回归鲍姆嘉登的美学学科与人的现实生活的过程。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近代以来的学科分化体制下越来越专门化、纯粹化的美学理论,其主导地位已经越来越受到当今美学研究者的质疑,越来越在与人的伦理生活息息相关的,丰富、多样化的文学艺术现象及社会现实问题前束手无策。纯粹的美学理论已经不再受到欢迎了,而这无疑正是美学回归人的伦理生活,回归社会现实,重获阐释有效性和学科知识合法性的重要契机。

对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之认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西方美学的学科特点、方法论和思维特点要有一个理性的、准确的认知。当下,现代学科分化体制之下的美学学科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基础、多样的方法论以及人文性的思维方式。多方面的知识基础主要指,美学要有自然科学、历史学、艺术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的支撑。只有通过这些知识的支撑,美学才能准确理解复杂的生活现象、文学艺术现象,才能对之进行有效的阐释,才能解决这些现象所呈现的问题,才能获得学科知识的合法性。这就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主要是指研究者既要熟悉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要熟悉与美学相关的、相近的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最新的研究方法。只有充分熟悉并熟练运用这些方法,我们才能在研究美学问题时选择、使用恰当的研究方法。而恰当的研究方法又与良好的思维有关。多样化的研究方法需要有多样化的思维特点。多样化的思维特点主要指思维的灵活性、综合性、发散性等。只有具有这样的思维特点,研究者在思考美学问题、建构美学理论时才能既不偏离美学学科,又保持开放性。

当前,美学在阐释有效性和知识合法性上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学学科特点、方法论、思维特点之综合性认识不足。当下的美学研究者应该对这一问题有清醒的认识。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之综合性特点,才能理解该问题对于克服当下美学所面临的理论阐释的有效性和学科知识的合法性问题之重要学术意义。西方美学学科的这些特点也是中国古典美学所具备的。因为,中国古典美学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圆融、诗意空灵、生生不息的境界,是混融一体的。这既是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的契机,也是摆脱自身面临的阐释有效性和知识合法性问题的契机,更是全球化语境下中西美学对话、中国现代美学话语建构的契机。在我们认识到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之间相通性的同时,也要认清二者间的差异。在我看来,二者之间差异的核心是,西方美学相对偏重于人的精神生活,中国美学相对偏重人的物质生活。其实,人的精神生活与人的物质生活都是人的伦理生活之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因为西方美学疏离于关注人的物质生活,因此,西方美学才无法对与人的物质生活有关的文学、文化、艺术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无法有效地解答与人的物质生活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才会出现知识合法性危机问题。正因为中国美学对人的精神生活关注不够,中国美学才无法建构出具有独创的严密逻辑的理论体系。今天,我们能克服以上不足,建构出新的美学形态,既得益于以上认识,也得益于全球化的文化视野。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且具备了开放的视野,我们才意识到了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应对的迫切性。

参考文献:

- [1] B. 鲍桑葵. 美学史[M]. 张今,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5-39.
- [2] 凌继尧. 西方美学史[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3: 4-6.
- [3] 宗白华. 宗白华全集: 第3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6: 592-597.
- [4] 马克·西门尼斯. 当代美学[M]. 王洪一,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30-31.
- [5] 赵彦芳. 诗与德: 论审美与伦理的互动[M]. 北京: 社会科学文

- 献出版社, 2011: 22-23.
- [6] 赵彦芳. 审美与伦理: 从前现代到后现代[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5): 51-56.
- [7] 门罗·比厄斯利. 美学史: 从古希腊到当代[M]. 高建平,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271-401.
- [8] 鲍姆嘉登. 诗的哲学默想录[M]. 王旭晓, 译. 滕守尧, 校.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11.
- [9] 威廉·詹姆士. 实用主义[M]. 李步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0-11.
- [10] H W Schneider. *A History of American Philosoph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6: 61.
- [11] 高建平. 西方美学的现代历程[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387-391.
- [12] P Guyer. *A History of Modern Aesthetics: Volume 3*[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555.
- [13] 理查德·罗蒂. 哲学与自然之镜[M]. 李幼蒸,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责任编辑: 周春晖)

On the Three Aspects Concerning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Richard Rorty's Ethical Thoughts

HAO Ertao¹, HAN Liping²

(1.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2. Department of Discipline and Inspection,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The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Rorty's ethical thought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aesthetic history, the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Rorty's ethical thought is the re-integration of aesthetics and ethics in the post-modern era;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discipline, the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Rorty's ethical thought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equal dialogue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esthetic disciplines; Thir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actical needs of aesthetic theory, the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Rorty's ethical thought is the need for western aesthetic theory to maintain a balance among sensibility, social reality ethics and individual survival and keep its vitality. This is of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to the accurate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Rorty's ethical thought.

Key words: ethics; aesthetics; postmodernism;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Richard Rorty

本 刊 启 事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既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